

现代·凤凰丛书

想说忘记

周末皇牌大放送

主编/许戈辉

不易

Phoenix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末皇牌大放送·想说忘记不容易/许戈辉主编.-北京:现代出版社,1999.9

ISBN 7-80028-537-5

I. 周… II. 许… III. ①电视新闻-解说词-香港 ②大事纪-世界-现代 IV. 1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31866 号

周末皇牌大放送·想说忘记不容易

Zhoumo Huangpai Da Fangsong · Xiangshuo Wangji Burongyi

主编/许戈辉

出版发行/现代出版社(北京市安外安华里504号 邮编:100011)

国外及港澳台地区总发行/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

执行编辑/张芳

责任编辑/张俊国

封面设计 李法明 李伯红

印刷/北京新华印刷厂

开本/850×1168 1/32 11印张

字数/250千

版次/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/1~33000册

书号/ISBN7-80028-537-5/G·157

定价/20.00元

总 序

关于凤凰，中国人有许多美丽的说法：百鸟之王；带来祥瑞；象征美满。

传说终归是传说，“有凤来仪”毕竟只是人们美好的想像。事实上，谁也没有真的见过凤凰。

然而，今天我们说起这个话题，就会在脑海里产生一个栩栩如生的凤凰，这就是展翅飞翔在世界华人圈中的凤凰卫视。

“雏凤清于老凤声”，凤凰卫视是传媒界的新军，但问世不久，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，尤其是凤凰卫视的观众，对“凤凰”的栏目津津乐道，如数家珍；对“凤凰”的主持人了然于心，情有独钟；而“凤凰”的节目，更是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“凤凰”，已经成为许多观众的亲密朋友。

电视播出的节目是转瞬即逝的，而朋友是长久的。长久的朋友就应当相互了解，把屏幕上精彩的画面定格，编辑成书，既便于翻阅和收藏，又给观众朋友多一个了解凤凰卫视的途径，这就是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。

了解凤凰卫视，首先要了解凤凰卫视的人。

凤凰卫视集合了一群来自两岸三地以及世界各国的传媒精英人士，他们胼手胝足，勇猛精进，想人所不敢想，为人所不敢为，在创造华语电视新文化的同时，演出了一幕幕感人肺腑的活剧。这中间，既有威武雄壮的正剧，催人泪下的悲剧，也有令人开怀的喜剧。酸甜苦辣，伴随着凤凰卫视员工的脚步。“心随长风去，吹散万里云。”李白的诗句抒发了中国文化人的凌云壮志，用来表现凤凰卫视员工的心志，也是颇为贴切的。

有了优秀的人才，才会有优秀的节目。

观众喜爱“凤凰”，首要的是因为凤凰卫视拜社会之所赐，也尽自己之所能，深切关怀民生状态，尤其是两岸三地的民生状态。张子强、白小燕、林滴娟，金融风暴、内地抗洪、印尼骚乱——大事小情，尽在凤凰卫视的眼界里，尽在凤凰人的怀抱里。对人间一切之不幸，凤凰卫视虽无普度众生之神力，却也不敢漠视，总是以一颗仁心，为之鸣与喊；对人间一切之正义，凤凰卫视虽不敢忝列先进，却引以为自豪，总是以一腔热忱，为之鼓与呼。

观众喜爱“凤凰”，还因为凤凰卫视把观众的要求摆在首位，观众的需要，正是凤凰人努力的目标。惟其如此，“凤凰”才有不断出新的栏目：《凤凰早班车》、《时事直通车》、《杨澜工作室》、《小莉看时事》、《锵锵三人行》、《音乐无限》、《财经报道》；“凤凰”才会有不断推出的精彩节目：《飞越黄河》、《香港回归》、《戴妃葬礼》、《北大百年》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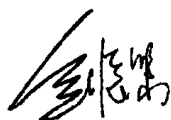
“凤凰”有自己的追求。

传媒是社会公器，传媒人所扮演的是一个公众信托人的角色。因而，对于谋求公众利益，凤凰卫视自然是责无旁贷。凤凰人的追求，就是通过传媒为尽可能多的民众效力，维护人类的尊严，弘扬和创造人类的文化。

凤凰人时时感到自己肩头的重任。

“何以报知音，永存坚与贞。”出版这套《现代·凤凰丛书》，目的并非用于炫耀“凤凰”的业绩，而在于表达我们对社会的一片诚意，纪念我们和观众之间，令人感动的一件件往事。

凤凰卫视有限公司
董事局主席 行政总裁



目 录

○ 总序 刘长乐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3 | 北大缤纷一百年/主持人：许戈辉 |
| 95 | 中美半生缘/主持人：曾滢漪 |
| 145 | 世纪贼王落网记/主持人：窦文涛 |
| 175 | 世纪贼王终结篇/主持人：窦文涛 |
| 213 | 老舍诞辰一百年/主持人：杨涓 |
| 249 | 想说“忘记”不容易/主持人：曾滢漪 |
| 281 | 借问何苦上青天/主持人：陈鲁豫 |
| 317 | 东航 586 成功迫降/主持人：许戈辉 |
| | 藏书票 0501/周末皇牌大放送·想说忘记不容易 |



主持人：许戈辉

北大缤纷一百年

主持人：许戈辉

老园子的变迁

许戈辉：这是北京景山公园东门外一条极为普通的小胡同，不过不要小看它，200多年前，这座破落的院门曾经朱漆灰瓦，



200多年前京师大学校园

坚固巍峨，住着乾隆皇帝的四公主；整整 100 年前，光绪皇帝又降下圣旨，将这里改为京师大学堂的校园，这座大杂院于是就成了北京大学的摇篮。

100 年前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在虚弱不堪的清王朝内部，鼓动起一个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运动，在这场永载史册的“戊戌变法”运动中，康有为几次催促光绪皇帝，请求他批准加速筹办京师大学堂。

光绪皇帝终于下了圣旨，将乾隆爷四女儿的和硕和嘉公主府，开辟为“京师大学堂”。大学堂的南边就是当时的皇宫故宫，后来帝制取消，故宫南门天安门又成为一种政治符号，这就使得北大学生总是不满足于求知求学，更愿意关心天下兴亡，因此“闹学潮”成为北大的一大景观。

光绪皇帝任命自己的老师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。后来，京师大学堂发展成为北京大学，而管学大臣孙家鼐可以算是北大的第一任校长。

许戈辉：不过好景不长，戊戌变法失败，皇帝被囚禁，才当了两个月管学大臣的孙家鼐愤然辞职。事隔不久，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，俄国兵和德国兵占据京师大学堂充当兵营，又拆房又烧书。1900 年夏天，慈禧不得不下诏，停办京师大学堂。

到了 1902 年 1 月，慈禧太后又下令恢复京师大学堂，并任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。张百熙聘请了一批当时的学术名流来掌控京师大学堂，学问纯粹的吴汝伦为总教习，学贯中西的辜鸿铭为副总教习，教育家蔡元培为经史教习。此外，张百熙把 1860 年由总理府创立的同文馆，并入了京师大学堂，改名为“译学馆”，其中的八旗子弟和洋人教师统统转入京师大学

堂。因为翻译了《天演论》而四海闻名的严复，被聘为学堂译书局总办，《茶花女》的翻译者林纾为副总办。

1912年2月，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，袁世凯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。同年5月，京师大学堂改名为“国立北京大学”，严复改称为“校长”。

不过，严复体质欠佳，含辛茹苦地工作了两年之后，60岁的他辞去了校长职务。

1916年，北大工学院院长胡仁源代理校长，亲手设计了北大红楼，地点就在京师大学堂的西部。1918年秋天，红楼落成，校长已换成了蔡元培。在当时的北京城里，4层的建筑格外显眼，因为楼身又呈红色，被当时的北京人叫作“北大红楼”。

大多数人并不知道，北大并不仅仅只有一座红楼，红楼只是北大三个教学区中的一个，由于红楼前面笔直地横过一条叫作“汉花园”的大街，因此红楼所在院落，也叫“汉花园”，汉花园里装纳着北大文学院。

红楼建成后，原先的京师大学堂改为北大理学院。

许戈群：当年，红楼东侧有一条小河向南流去，河东岸叫“黄城根儿”，河西岸叫“北河沿儿”。在58路公共汽车的站台上有一个地名是“骑河楼”，可以想见，当年定有一座独具匠心的小楼，曾浪漫地骑跨在小河上，左脚站在黄城根儿，右脚落在北河沿儿。

现在的中国民政部大楼，最早是京师大学堂的同文馆，红楼出现后，这里成了北大法学院。蔡元培任校长时，法学院的拱形门里开了一家北大学生储蓄银行，为的是增进北大学生的理财能力，经济学家马寅初是当年的银行行长。

北大的老灰楼前面曾是一个巨大的广场，广场再往前就是那座闻名于世的红楼。那时，灰楼是研究生宿舍。实际上它是3座弯接在一起的楼房，它的形状仿佛是一个差一笔没有写完的“口”字。据说如此建造，完全是为了方便校方控制学生。灰楼一共有8个门，依次是“天”、“地”、“玄”、“黄”、“宇”、“宙”、“洪”、“荒”，就是《千字文》的前两句。但8个门中，通向外界的只有“地”和“黄”两个门洞。因此，一旦学潮涌动，学校只要堵住这两个门洞，灰楼便会水泄不通。

许戈辉：灰楼南边的广场就是1919年“五四”学潮的策源地。1947年，北京学潮再次从这里推向全国，矛头直指国民政府。从这一年开始，这个广场被北大学生命名为“民主广场”。不过今天，广场不广，由于北大早已迁往西北郊区，广场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简易楼，尽管国家文物局一再强调这是文物保护单位，但是蜗居这里数十年的中国作家协会苦于无处可走，依然故我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北大迁移到南方；1946年，北大在内战前夕，又回到了汉花园大街，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剑拔弩张，到了决战关头。

在汉花园校园里，完好保存的惟有这个院落，它曾是北大校长的办公基地，蔡元培、蒋梦麟、傅斯年、胡适等都曾在这里主持过校政。

每年春天，这里的花树依旧，只是踩踏落花的主人不再是北大的校长，而是中国文化部历届的部长和副部长。

许戈辉：北京人管汉花园这片地方叫“沙滩儿”。古时候的水域形成的那一小块沙滩，今天早已无影无踪，沙滩儿只是北

京人含混不清的记忆。不过北京人都知道，沙滩儿是个很小的地方，北大必须寻找更大、更广阔的空间。

1952年，中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院系调整，北大用自己的历史留给汉花园大街一个新的名字“五四大街”，随后便从散落于汉花园四周的3处地方向北京的西北迁去，汉花园红楼给了国家文物局，民主广场给了中国作家协会，大部分院落给了文化部，而京师大学堂遗址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，北河沿儿拱形门里的大院子归了民政部。

许戈辉：200多年前，未名湖不叫“未名湖”，它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自家后花园的内湖。和珅的家产充公后，这个地方并入圆明园。幸运的是，1860年英法联军的大火烧毁了圆明园，却没有向南蔓延到这片园子。

1900年是中国的庚子年。这一年，八国联军击溃了清朝。当清朝官员按《庚子赔款条约》，把白银送到美国使馆时，美国人把钱如数退了回来，他们希望中国政府把这笔钱一分为二，一部分用作中国留学生赴美基金，另一部分建一所教会学校，由美国人执政，地点就在和珅的家宅，校名是“燕京大学”。

燕京大学所在的这一大片园子，后来有了一个温馨的名字，叫“燕园”。一直到90年代初，这片老园子都因其远离北京城的喧嚣，而显得格外宁静。除了清华大学，北大的校园实在是又大又美丽。

许戈辉：1952年，北大迁出了巴掌大小的沙滩汉花园，降落在燕京大学这片老园子之中。那时，北大医学院和北大农学院独立，分别扩充成北京医科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，北大工学院则划入清华大学，而北大吸纳的是清华文学院和理学院，以

及燕京大学的全部。从此，燕京大学不复存在，融化在北大之中。

进入北大西门，可以看到草坪上竖立着两座古代的华表。这是两个真家伙，绝不是仿制品。原先立在圆明园，被组建燕京大学的美国人移到此地。

华表相传始见于尧的时代。不过尧时华表不像现在这样，是木头的，竖着一根，上边横着一根。华表木就像路标，尧把它立在大道口上，给人指路。

许戈辉：华表顶端的动物叫狴，是龙的9个儿子之一。放在皇宫门里的华表，狴冲着北方，名叫“望君出”，每当民间发生灾害时，望君出就呼唤君王出宫；宫门外的华表上，狴冲着南方，叫“望君归”，君王如果在宫外玩得太久，望君归就会提醒说：回来吧君王。1952年，北大离开了沙滩的民主广场，却来到了华表的跟前，而关注社会的天性，100年里从未改变。

“此时幸遇先生蔡”

许戈辉：国子监是中国古代大学的最高学府，专招七品以上官员的孩子，学习儒家经典。1898年，为了区别于科举考试，宣传新知，维新改良派创建了京师大学堂，梁启超代表清朝总理府和军机处，草拟了办学章程。“中西并用”被第一次明文提出，专设一个西方语言系。

1902年，京师大学堂恢复后，由于得到了慈禧太后和管学大臣的支持，京师大学堂可以每年从清政府得到20万两白银的经费，各省还须另外分摊它的其他费用。此外，各省保送学生

来京，要为保送学生治装、出路费，学生在京师大学堂是全奖学习，吃喝住行都是公费，毕业后相当于进士。自然，他们得尊孔读经。

京师大学堂毕竟是唯新运动的产物，而学生们又自认继承太学传统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。1903年，沙俄对中国东北提出领土要求，京师大学堂学生不顾高压，集会抗议，组织“抗俄铁血会”，表示“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，‘伏阙上书’”，成为北大历史上第一次学生运动。从此，北大与中国的政治运动总是密切相关。

1904年，京师大学堂派出第一批留学生。



1904年京师大学派出第一批留学生

1905年，国子监被最终废止，京师大学堂成了晚清惟一的综合大学。全校分为文、理、法、工、农、商、医7个学院。此外，它还负责管理地方学校和编译课本，有着类似教育部的职责。

许戈辉：京师大学堂曾经出了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，比如发现了水杉的植物学家胡先，还有作了国民政府司法总长的法学家张耀曾。但新政后的京师大学堂，不过是国子监的变种继承。由于当时许多学生是满清贵族的子弟，所以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听差，上学只为升官发财。据说上体育课时，老师要先给学生鞠躬，喊一声“老爷”，然后才能毕恭毕敬地喊口令：“老爷，向右转，老爷，向左转……”

1912年，袁世凯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，不久，京师大学堂改名为“北京大学”，严复当了校长。

就任校长后，严复碰到的头疼事首先是经费不足。教育部曾以缺少经费和管理不善为由，建议停办北大。年近六十的严复四处奔走，筹措经费，使新生的北大得以维持。

严复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不全面的改革，再次废除了尊孔读经。但蔡元培来到北大之前，北大还不是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中心，而是学生们升官发财的一截梯子。蔡元培的贡献就在于，他把改革不彻底的北大，改成了现代大学，通过择优录取，获得合理的学生成分。如今这种勤学苦读的场面，早在80年前就已形成。那正是蔡元培先生所苦心经营的。

许戈辉：历史学家顾颉刚是1913年考入北大的，他后来回忆说，当年北京人曾调侃地说，常常光顾八大胡同的大多是“两院一堂”。“八大胡同”是当年北京的红灯区，“两院”指的

是国民政府参众两院的议员，“一堂”就是京师大学堂的老师和学生。

1914年，严复辞职，北大的校长3年内像走马灯一样换了3位，但北大还是北大，学生们一边读书，一边逛八大胡同，一边还热心政治。

钱理群（北大中文系教授）：从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到袁世凯称帝，一直盛行一种思潮，想通过国家的力量，通过强权的力量和最大限度地实行社会总动员，建立一个统一、富强、独立的国家。这么一条思路，我们把它叫作国家主义思潮。就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，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。在这样的背景



1912年 北京大学校长严复